

# 论薇拉·凯瑟《我的安东尼娅》女性生态的自我实现

郭玉鑫

(黑龙江外国语学院 英语系,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要:**独特的生活经历使薇拉·凯瑟成为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描写美国西部拓荒时代的女性作家,在她的内布拉斯加系列拓荒小说《我的安东尼娅》中蕴含“平等、友爱”,“雌育意识”以及对男性“功利,话语权控制”的充盈扩张行为进行批判,体现了作家女性的生态敏锐度。通过分析小说中主人公安东尼娅生态自我的实现过程,确定以“诚实、互惠、关怀、友谊”为核心价值的价值观念,而这种价值观念正是“女性原则”和“生态原则”的结合。

**关键词:**女性原则;生态原则;生态自我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19)03-0066-03

两性关系良性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并存是人类一直致力追求的生存目标,这种新生活的实现要求必须转变原有的二元思维模式以及在此模式下形成的对自然和女性奴役的态度;并牢记地球上所有的物种都是处于一个相互联系的网络之中,人类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凌驾于其他物种之上;同时人类向自然靠近的过程既是找寻自我的过程,同时也是意识到自然的内在价值的过程,是人类攫取力量的源泉。本文将从小说《我的安东尼娅》中体现出来的男权中心的颠覆和人类中心的解构两个方面去论述。安东尼娅生态自我的实现实际上是经历了两个极为痛苦的过程实现的,一个是对占主导地位的男权中心的颠覆过程,另一个是对占统治地位的人类中心的瓦解过程。通过对女主人公生态自我的实现过程的剖析,希望对人类生态文明的建设和两性关系的和谐发展有所启迪。

## 一、占主导地位的男权中心被颠覆的过程

对于女性而言,自我决定权意味着从职业中解放出来,从父权社会的话语中彻底解放出来,这种对决定权的要求是基于自我防卫的一种抵御性

的基本权利。安东尼娅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是父权社会制度下性别歧视的反抗者。她经历了从对父权社会的权力屈服,到意识到为自由而抗争,最后再到生态自我的最终实现这样的历程。在安东尼娅的家里,家庭成员分工就是对父权制社会下男女分工的完美阐释,人们在父权制度下普遍接受的观点是“男性所承担的社会分工被认为是重要的,在文化上、道德上、经济上得到回报,女性所承担的社会分工被认为是次要的、附属的”,在这种性别期待下,女性变得被动、软弱、自卑,甘愿服从男性意志,因此安东尼娅才会有这样的恐慌“如果我保不住这匹马的话,在明天早上之前我就去池塘里淹死自己”<sup>[1]</sup>。马尔科姆·沃斯特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在家庭当中,年龄最大的男性长者至是无上的,他的统治扩展到了生与死,无条件的加在孩子和家人身上,就像加在奴隶身上一样。安东尼娅的哥哥在父亲死后就是家里的绝对权威。父权制下女性对于男性的屈服还表现为对男性的所谓“阳刚之气”的崇拜,女性批评家波伏娃曾说道“在男权社会的法则下,女人的无知和无能引起他们对英雄的盲目崇拜”<sup>[2]</sup>,安东尼娅用崇拜的口吻描述吉姆杀蛇的“英勇”行为以及对于哈林的盲目崇拜都是父权制下女性卑微地位的

收稿日期:2018-12-09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阶段性成果(17WWE368)

作者简介:郭玉鑫(1980—),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表现。安东尼亚没有满足于这样的生存状态,是颠覆传统家庭观念的典型代表。她艰难的抗争过程是从她努力开始争取自己跳舞的权利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自我实现的第一步。跳舞对于她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活动,更是一种权利与尊严的象征,虽然还不具备完全独立的自我意识,但已经意识到作为独立的个体,她有权利追求幸福和自由。在和库扎克结婚以后,她的家庭地位更加凸显,这样的婚姻是建立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友谊与激情并存的基础上的,是生态女性主义提倡的价值观在爱情观中的体现。当然,安东尼亚的女性气质在她和库扎克的完美结合中得到充分体现,她成为十一个孩子的母亲。需要指出的是,安东尼亚并非回归到了父权制下女性的刻板地位中,相反,作为母亲的新身份赋予她获得独立与幸福的活力与动力。有些评论家甚至称安东尼亚为地母,这是一种神话原型的再创造,正是这种自足的生育能力保证了种族的延续,这和生态女性主义者的“雌育”核心是不谋而合的。而女性丰富的想象力和敏感的洞察力使她对土地的看法也迥然区别于费勒斯中心主义下的男性价值观,她认为土地不仅仅是获取经济利益的工具,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潜力,这就把土地置于和女性一样的地位,因此她能够读懂“大自然这本难懂的书”<sup>[3]</sup>。

安东尼亚的“自我”是建立在与其他生物紧密相连,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是一种“生态的自我”,是个性与共性并存,人性与自然性结合的一种“自我”。

## 二、占统治地位的人类中心被解构的过程

父权制的思想根源是人类中心主义,父权制的解构过程是伴随着人类中心主义被瓦解的过程而进行的。因为在西方宗教、文化和神话中,妇女和自然都是相互关联的,都是被贬低的。当谈到西方和中国戏剧中女性受害者时,中国教授闫启刚曾说道“传统的悲剧,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基督教中,都取决于一个有序的世界,由一个既定的神话秩序所统治。这个世界的限制和意义是众所周知的,至少是毋庸置疑的。这样的神话秩序有其社会性质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等级社会结构。”<sup>[4]</sup>

为了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生存,尤其是在她父亲去世后,安东尼亚展现出男人的气概,和她的

哥哥安布鲁斯一起,为驯服这片土地而努力。她每天最关心的是今天耕耘了多少土地,她为自己能像男人一样工作而骄傲。她颠覆了传统女性角色的形象,同时也具备“竞争意识”这一在父权制中被标榜为男性特质的要素。“你看看杰克一天耕耘了多少土地,我可不想他比我耕的多,今年秋天我要收获更多的玉米”,作为传统价值的捍卫者,凯瑟执着的追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两性关系熔融发展的诗意的生存状态。二十年后当吉姆重返草原,他看到的是一个虽然“身材微胖,头发花白,牙齿几乎掉光,饱经风霜”但依然年轻、充满活力的安东尼亚。安东尼亚乐观的精神,充沛的体力让她的个性更加迷人。在作品中,凯瑟呈现出原始的、未经雕琢的自然美与拥挤不堪、杂乱无章的现代生活之间的张力,她再现的是安东尼亚一家尊重自然、融入自然、尊重大地的道德与控制、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sup>[5]</sup>。安东尼亚拥有巨大的爱的能力正是生态女性主义者眼中的“多产的、充满母爱与关怀”的“大地女神”形象。她的丈夫库扎克对于妻子和孩子们的关心,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是人类责任的体现,他的口袋里总是装着某种小玩具来逗一下孩子们,当他拿出纸蛇的时候,小心翼翼,以免吓到他们。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人类的责任不仅体现在对生命的态度上,还取决于对另一半的尊重上。在库扎克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女性气质,如关怀、宽容、理解和爱等,酷儿理论坚持认为人是“雌雄同体”的概念,此处“雌雄同体”并非指生理上的,而是气质上的同体,即每个人都是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结合体,所谓通常意义上的“男性”和“女性”也只不过是社会赋予的价值观下男性气质或者女性气质更突显而已。至此小说开始的以安东尼亚的哥哥为代表的男权中心彻底被颠覆,征服自然、“强暴”自然的生产方式被二十年后安东尼亚化身为“大地母亲”,身体和土地都结出累累硕果,人和自然,男性和女性和谐生活的画面所取代。安东尼亚和库扎克为我们树立了人类新生存方式的典范,他们诗意的、自然的生存状态印证了一种可能,虽然男性和女性气质有别,但我们可以通力合作,各自扮演好在生活中的角色,人类和谐的生态的生存方式是可以实现的,这在生态危机、两性关系危机四伏的今天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凯瑟在小说中让吉姆以叙事者的身份出现是

为了阐述在女性生态自我的实现过程中男性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童年时期的草原生活对一个人生态意识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态意识必定与童年某个特定的区域相关联,这种关联充满着魔力,它能使人产生生态想象,如果没有这种特殊的经历,很难使人成为自然忠诚的守卫者。吉姆便是这一理论的典型例证,吉姆在父母死后,重新回到草原生活,一望无际的、带有生命力的荒野让他终生难忘。根据生态学家的观点,儿童眼中看到的是一个“纯粹的、天真的、动物化”的世界,吉姆眼中的草原便是如此,动物是草原的主人,人类与动物相互关爱和谐共存,当时孩子眼中是纯粹地对草原的敬畏之情。其次安东尼娅的丈夫库扎克,作为男性的代表承担了对家庭责任的分担,实际上在生态女性者眼中他承担了生产的责任和维护生命的义务,他给予妻子情感上的支持,而这在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权社会中被认为是本应属于女性的责任和义务。从生态批评的视角看,生态问题事关每个生命的生存状况,是人类的共同问题,因此,只有彻底的抛弃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权中心,我们才能融入自然中去,实现真正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 三、安东尼娅“生态自我”的实现过程

人有与生俱来的对自然的依恋和热爱,这在早期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主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文人墨客倾尽笔墨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与狂热的爱。安东尼娅对草原生活亦是如此,“我在城市里一直很孤独,孤独得几乎死去,我喜欢这里,这里有我熟悉的每一棵树,我能叫上每一朵花的名字,土地是那么的亲切,我愿意死在这里”<sup>[1]</sup>。土地赋予女性的亲切感会使女性获得自信与活力,并赋予女性一种“自我”意识,在生态批评者看来,这种“自我”不是通过贬低他人而实现的,而是建立在与万物的共联基础上的。这是一种“生

态的自我”<sup>[6]</sup>。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凯瑟笔下以安东尼娅为代表的一代女性最终把贫瘠的内布拉斯大草原变成了富饶肥沃的花园,不仅如此,这样的女性身上还有着强大的感染别人的力量,如给吉姆带来了他曾熟悉的温暖与活力。凯瑟对此的解释用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一句话就是,人类最满意的生活方式便是与土地无穷无尽的斗争过程。安东尼娅,一个普通的顿悟者,回到草原,与农民结婚,生了一堆强壮的孩子,重获自我,变贫瘠的土地为丰饶的土地,这是一个华丽的转变,是一种生态自我的实现。吉姆·伯顿既是故事的参与者,又是故事的叙述者。他的成长交织着对边疆生活的探索,拓荒者与移民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他的男性的特殊身份正是诠释了一个男性在女性意识的感召下其生态意识的觉醒,作为一个极其热爱自然的浪漫主义者最终克服了男权社会带给他的困惑和挫折,通过与女性和自然的和解,最终实现了精神家园的重建。

### 四、结语

在如今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人类面临空前的生态危机,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除此之外,人类还面临精神家园的荒芜,在这样的双重危机下,薇拉·凯瑟《我的安东尼娅》中为我们呈现了人与自然、人和人和谐相处的美好画面,揭示了简单的草原生活所蕴含的巨大的价值和意义而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他们的生活正在失去意义,变得琐碎。只有通过回归田野,人类才能找到内心的宁静,凯瑟似乎暗示了一个可以通过恢复农业或田园生活而实现的黄金时代的到来。而真正地实现这一时代,我们必须转变思维方式,同自然和谐相处,重塑自我的同时也在重塑这个时代。尽管这个过程是艰难的,但在男女两性的合作下,人类“诗意的栖居”是可以实现的。

### 参考文献:

- [1] Cather Willa. My Antonia.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tephanie Vaughn[J]. New York: Bantam Classics Books, 1994: 21.
- [2] Warren Karen J. Ecological Feminism[M].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121.
- [3] Yang haiyan. Red Cloud Revisited: An Ecofeminist Study of Willa Cather[M]. Chengdu: Si Chuan University Press, 2006: 46.